

无住生心

一代报人刘鉴铨



(马来西亚) 萧依钊 主编

刘立忠 欧银钊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无住生心

一代报人刘鉴铨



(马来西亚) 萧依钊 主编

刘立忠 欧银钊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本书由作者萧依钊授权，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受国际版权公约保护。

广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9 - 2017 - 0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住生心：一代报人刘鉴铨/（马来）萧依钊主编；刘立忠，欧银钊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7. 10

ISBN 978 - 7 - 5668 - 2037 - 2

I. ①无… II. ①萧… ②刘… ③欧… III. ①刘鉴铨—传记
IV. ①K833. 385.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6957 号

无住生心：一代报人刘鉴铨

WUZHU SHENGXIN; YIDAI BAOREN LIUJIANQUAN

主 编：（马来西亚）萧依钊 著 者：刘立忠 欧银钊

出 版 人：徐义雄

策划编辑：黄圣英

责任编辑：牛 攀

责任校对：葛舒旻

责任印制：汤慧君 周一丹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510630）

电 话：总编室（8620）85221601

营销部（8620）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邮购）

传 真：（8620）85221583（办公室） 85223774（营销部）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排 版：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广州天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0.25

字 数：192 千

版 次：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0 月第 1 次

定 价：4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一

报人的泪光

钱 钢

刘鉴铨先生是一位报人。《无住生心》以“报人”为尊称，我猜想，这不仅因为本书主人公曾获马来西亚“国家报人奖”，更可能是作者想用华文世界这一承载着厚重历史的称谓，作为刘老总生涯的标识。

汶川大地震后不久的一天，我和妻子于劲在八打灵再也的星洲日报社和刘鉴铨先生有过短暂的倾谈。我们不熟，却一见如故。信马由缰的谈话，温暖、亲近，偶有心与心的碰击。已经无法追忆谈话内容，然而清清楚楚的，我们记得刘先生眼里一闪而过的光亮。是的，是泪光。

读《无住生心》，就是读这一抹光亮。字里行间，可见黑苍苍的大山，有经年的腐叶、荆棘藤萝、猛虎，还有缠足的毒蛇。那个习螳螂拳自卫的少年，小心节省地舔着仿佛印着细密年轮的圈圈饼，走出这山，却步入另一片更凶险的丛林。这是一位报人的生命史，也是《星洲日报》这份报纸生命史的重要一章。

报人是报刊业从业者，但并非所有办报者都配得上“报人”之名。为强权奔竞的社长、总编，大概更愿意称自己是官员；金钱至上的报老板，也对“报人”避之唯恐不及。报人视报刊为公器，讲人格、讲报格，不媚强梁、不阿群众，有所争有所不争。然而这一切，知易行难，在大变动时代，在转型社会，尤难。

今天的转型，肇始于政治与社会的演变，亦发端于资讯科技的腾飞。人们已在预测，某年某月某日，报纸将寿终正寝。然而我坚信，变形、消失的，只是资讯载体的外在形态。即使有一天，触摸屏上的浏览完全代替了印刷媒体的阅读，媒体传统的基因仍将长存，“报人”独有的气息仍会飘漫，前辈报人的故事，依然会令真正的传媒人心驰神往。

报人，他们是怎样的人？

他们或许嗜书如命，却与术业有专攻的学者风格不同；或许不乏才情，却不是天马行空的艺术家的；他们天天和政治打交道，有时简直成了“政治动物”，但

老实说，他们绝大多数不适合从政，因为他们生性太率直天真。

选择做报人，是选择一种人生。我曾对大陆的传媒朋友说过：新闻，是活泼的人从事的严谨的事业，是炽热的人肩负的冷静的使命，是浪漫的人从事的一锤一凿的艰辛劳作。《无住生心》说的，不也正是这样的故事？

报人赖以支撑自己的哲学，其实不深奥，甚至可以说“卑之无甚高论”。本书记述的报人生涯，定会勾起台湾同行的记忆，让他们回到那并不遥远的“黑夜里寻找星星”的昨天；会让中国大陆同行掩卷叹息。深山里的石竹，从岩石缝隙里顽强探头，追着一缕阳光扭曲生长。这不正是华文世界众多追求新闻自由的人的真实写照？

刘老总说，新闻自由其实就是吹气球，你吹得太大，气球就会破，但你不用力去吹，气球就越来越小，你就越来越远离真相、远离正义，读者就会离你而去；刘鉴铨先生说，媒体受约束的范围，犹如一个圆周，一个听话或者胆小怕事的新闻人，会一直停留在圆心，其实在圆心和圆周之间仍有很大的空间，一个好的新闻人，应该尽量去接近圆周，在踩中地雷之前，还有很多发挥空间；他还说，在火山和地雷阵前，要选择绕行的道路……

他不会为此自豪。这些话语是苦涩的，它折射出现实的冷酷，透出深深的无奈，很难被渴望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青年认同，甚或会招来误解乃至攻讦。马来西亚的报人在“丛林”中有自己的“螳螂拳”，无独有偶，中国传媒有“猴拳”，他们形容自己是在“八仙桌下打猴拳”，制约重重，唯有靠毅力和智慧撑开空间。

在史书和现实中，我认识许多报人。他们挺身站立，但称不上参天大树；各有其勇，但未必成为英烈。他们带领着长长的队伍，为将士愁，为粮草忧，风里雨里，踉跄前行。他们配得上“上善若水”的哲言，因为他们甘愿“处众人之所恶”。他们并不炫目，但在自己认定的位置，执拗地、恒久地发出微弱的光。

新闻事业正在经历深刻变革。我爱这个事业，它是亿万点星光汇成的浩瀚银河。在那里，有刘鉴铨先生的一抹光亮。

（钱钢是我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及记者，现任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序二

替一位老报人历史添加一点注脚

王健壮

其实，我跟刘鉴铨先生至今只有一面之缘。

时间是2010年11月9日，地点在台北市新舞台，他是第二届“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贡献奖”海外地区得主，我是台湾地区得主；我们两人虽比邻而坐，但因为彼此陌生，那天晚上我们之间仅仅礼貌性地寒暄了几句。

在与刘先生初识前，他的名字我当然早就听过；他的故事——一个马来西亚华文媒体老报人的故事，我过去也略有所知。但当我看到萧依钊写的主旨是“I need your help”的那封e-mail时，我仍然犹豫了一会儿：为一本纪录刘先生报人故事的书写序言，可能太冒失了吧？我虽知其人其事，但终究与书中主角只有一面之缘，可能不太适合吧？但几个小时后我回e-mail给依钊：“我虽然只跟刘先生台北见过一面，但能替一位华文媒体令人尊敬的老报人历史添加一点注脚，我义不容辞。”

我对“报人”这两个字、这样一种角色，一向有解不开的情结。几年前，我曾为香港《明报》副刊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举目不见一个报人”，文中既感慨文人办报的传统已被商人办报的现实所取代，也感慨新闻圈中已无人再以报人自期，许多人对市场规则妥协，没有人再以追逐影响力作为办报的最高价值。我甚至很悲观地做了一个预言：“期待另一个报人的诞生，确实就像期待弥赛亚降临一样，永远只是个梦。”当年的预言，证诸台湾今日媒体的动荡起落变化，不幸果然成真。

但台湾地区已经消失的报人身影，却出现在马来西亚的土地上。萧依钊曾说：“（20世纪）70—90年代，我们马来西亚的新闻人都在仰望台湾。”所谓仰望，就是仰而望之，有羨而慕之的意思，也有学而习之的味道；但夸张一点说，那个年代的台湾媒体即使不是华文媒体的典范，起码也是个模范生。

2010年12月下旬，我应依钊之邀与香港名嘴杨锦麟组成“港台二人转”去吉隆坡与檳城演讲那几天，我从《星洲日报》版面的字里行间，却仿佛看见了



70—90年代台湾媒体的影子，依稀旧时影，让人蓦然又怅然。

马来西亚华文媒体走过的路，坎坷一如早年台湾媒体。刘鉴铨先生说马来西亚新闻人头上有“五把刀”，台湾地区当年在“戒严”时期新闻人头上的“刀”可能逾九把；刘先生警告年轻记者新闻线上有许多“地雷”，台湾地区当年更不知有多少人因误踩“地雷”而受害受难；刘先生那一代的马来西亚华文新闻人曾经历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与1987年的“茅草行动”，台湾地区媒体当年卷入的政治事件数不胜数。

马来西亚媒体目前正走在新闻自由“多少”的路口。如果哪一天政治彻底松绑了媒体，头顶上的“五把刀”消失了，脚底下的“地雷”也扫除了，马来西亚新闻人也要像现在的台湾地区的新闻人一样，面临着新闻自由“好坏”的考验。刘鉴铨先生说“政治令人性的丑恶毕露”，“一半的真话也要说”，不仅表示他一生在争取新闻自由的“有无”，也代表他对新闻自由“多少”的期待。

刘先生也许不喜欢被人以英雄视之，但新闻事业在本质上从来就是英雄的事业。一部人类新闻史，或者说一部华人新闻史，都是英雄写的历史，记载的也都是英雄的故事；刘先生从山林之子一步步蜕变成报人，半个世纪的新闻生涯让《星洲日报》一步步从小报变成大报，当然更是英雄写历史，他的故事也当然是英雄的故事。

报人之所以被称为报人，就像 reporter 被称为 journalist 一样，都是角色价值的被肯定，证明他们有道德勇气，也有进步意识。华人新闻史中“报老板”何其多，像刘先生那样被人称为“老总”的人也何其多，但报老板与老总能被当代人甚至后辈人定位为报人的却寥若晨星；“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年代，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蒙，这个启蒙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是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我一向很喜欢 Hannah Arendt 的这句话，也经常用来形容我尊敬的一些新闻人：“他们是黑暗年代中不间断地在闪烁的那些光亮，烛照当年，也引领后世。”

我虽与刘先生只有一面之缘，但就像他办公室挂的高适写的那首诗的那两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我虽非刘先生知己，但识君久矣，能替他的故事添加一点注脚，并写下 Hannah Arendt 那句话送给他，代表的是一位台湾老记者向马来西亚老报人的致敬。

青山不老，这是个隐喻，形容刘鉴铨先生，也形容他奉献五十年的《星洲日报》：他们的历史，“写在马来西亚的土地上”。

（王健壮是著名评论作家，曾任台湾《“中国”时报》总编辑、社长，现任世新大学客座教授）

目 录



序一 报人的泪光 钱 钢 /1

序二 替一位老报人历史添加一点注脚 王健壮 /3

第一章 春华秋实 /1

第二章 乱世寒窗 /19

第三章 踏上新闻路 /31

第四章 知兵非好战 /43

第五章 新的开始·旧的延续 /55

第六章 不拘一格降人才 /83

第七章 博弈游走地雷阵 /101

第八章 更与何人说 /117

第九章 无住生心 /131

附 录

附录一 2010 年第二届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贡献奖推荐呈文 /144

附录二 2010 Tokoh Wartawan Negara C. C. Liew /146

附录三 传承与分享 萧依钊 /150

第一章

春华秋实



2010年的10月，对刘鉴铨来说，可谓“双喜”临门之月。

这年的10月5日，台湾星云教育基金会宣布，时任世华媒体集团资深顾问、星洲媒体集团董事经理兼集团编务总监的刘鉴铨，获第二届“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贡献奖”。

来自海外的喜讯刚传，隔天，即10月6日，马来西亚国内捷报又至：刘鉴铨荣获由马来西亚新闻协会（Malaysia Press Institute）所颁发的国家最高荣誉新闻奖——“国家报人奖”。

“国家报人奖”是马来文“Tokoh Wartawan Negara”的直译。《星洲日报》副总编辑，同时也是马来西亚时评名笔的郑丁贤，后来在他的专栏里如此诠释：

“报人”是中文特有的一个用词，只能意会，难以定义。

大致说明，就是有守有为有风骨，奉献新闻专业的人；譬如民国时代《大公报》的张季鸾，为了新闻自由和专业，可以把性命放在一旁。

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千千万万，但是，能坐到“报人”的位置，凤毛麟角。

而马来文Tokoh，也有点抽象；必须把影响力、贡献、典范串在一起，成就卓越，才有Tokoh的分量。

……报人和Tokoh，是两种不同文化的意涵；字义上已经很接近了，但是，在精神方面，还是有一些不同。

而当报人遇见Tokoh，是一种能够擦出火花的撞击，也是一种美妙的融合。

创设于1988年的马来西亚“国家报人奖”，评审团由著名学者组成，遴选标准非常严格，22年来仅有8位报人获此殊荣。之前的7位得奖人皆来自英文和马来文报章，依序为：

- (1) 丹斯里阿都·沙末·依斯迈尔（Tan Sri A. Samad Ismail），1988年；
- (2) 丹斯里李秀毓（Tan Sri Lee Siew Yee），1992年；
- (3) 拿督依沙·哈芝·莫哈末（Datuk Ishak Haji Muhammad），1995年；
- (4) 敦莫哈末·费德·史提芬（Tun Mohamed Fuad Stephens），1998年；
- (5) 丹斯里米兰·阿都拉（Tan Sri Melan Abdullah），1995年；
- (6) 丹斯里马斯兰·诺汀（Tan Sri Mazlan Nordin），2000年；
- (7) 丹斯里再努丁·迈丁（Tan Sri Zainuddin Maidin），2006年。

有别于第八位得奖人刘鉴铨乃“一介布衣”，这七位得奖者除了在新闻界服务外，也曾在政府里担任官职或在国家政党中身居要职，政治色彩浓厚。

刘鉴铨是唯一不带官方或政党色彩、无党无派的得奖人，也是马来西亚华文报坛上获此荣誉的第一人。



无怪乎上一届（2006年）“国家报人奖”得主，现为“国家报人奖”评审团主席，曾任马来西亚新闻部部长的再努丁·迈丁在颁奖礼上致辞时，会将刘鉴铨形容为“难能可贵的纯粹报人”。

两大荣誉接踵而至，刘鉴铨是“双喜”的主角。但从宏观论之，“双喜”不完全属于刘鉴铨个人。

在华人报业跋涉半个世纪，刘鉴铨与《星洲日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数十载在新闻路上涉险渡难、披荆斩棘，他就像一只啼血的杜鹃，在风声鹤唳中永不放弃地为真理而歌。

高山流水，琴瑟和鸣，刘鉴铨与《星洲日报》在一次次突如其来的打击中伤痕累累，但也一次次凤凰涅槃般选择了顽强崛起。

因此，今天看似理所当然的荣誉，光环的背后却承载着太多难以言述的沉重。它属于刘鉴铨，属于《星洲日报》，也属于马来西亚华人报业的长征之路，事实上，它更应该属于马来西亚的新闻史。

刘鉴铨的“双喜”临门，应是对一位新闻斗士创伤的平复，亦是对勇士和智者的褒奖。无论如何，历史终于用这样一个客观醒目的“符号”，诠释了华文报章在筚路蓝缕之后，与马来西亚这块美丽土地无法分割的情缘。

荣誉的光环，很炫目；荣誉的背后，很纠结。那些看不见的弥漫硝烟，那些听不到的两岸猿声，那些刻骨铭心的风风雨雨，那些催人泪下的暗淡与绝处，那些痛彻心扉的桎梏与诽谤，那些为新闻理想而承受的重压，依然回响并镌刻在历史的深处，没有湮灭，也不能湮灭。逝者如斯，但正直的人们因为道义永远不会选择遗忘。

这是一个足以诠释历史的节点，而历史，总是用客观甚至冷酷的方式，昭示未来。鉴于此，刘鉴铨的“双喜”临门，实际上串联起了马来西亚华文报章的前世与今生。

这是机缘，亦是必然。

在马来西亚“国家报人奖”颁奖典礼上，马来西亚新闻协会执行长拿督查米尔声明，“国家报人奖”旨在表扬将一生奉献给新闻事业的业界翘楚，获提名者须符合该协会四项标准才能得奖。该会每年都接获一至两名候选人提名，但这并不等于这些候选人能够符合该协会制定的四项标准。



马来西亚内政部副部长、拿督阿布瑟曼颁“国家报人奖”给刘鉴铨

“这四项标准包括担任新闻从业员期间不断写出优秀的作品、直接或间接通过媒体为读者群贡献想法或理念、在所服务的媒体公司或非政府组织贡献良多，以及比同一辈的新闻从业员表现杰出。”

就是在这样高规格的标准下，刘鉴铨成为第八位获奖者，也是获得此项殊荣的第一位华文报人。

从1961年加入《星洲日报》任职记者至今，一直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从思维到理念，刘鉴铨与《星洲日报》早已融为一体，个人的荣辱得失，早已云淡风轻。

当然，得知获奖的那一刻，他也有些小小的开心，但更多的是涌动在内心的诸多感慨。

他首先想到的是《星洲日报》。那些与报纸一起成长的日子，与报社同仁肝胆相照的日日夜夜，历历在目。这是他殚精竭虑奉献了半生的事业。时光怳惚，《星洲日报》从当年的艰苦经营，至今已成长为马来西亚第一大报，乃至大陆和香港、台湾以外地区的最大华文报，而他已年逾古稀，满脸沧桑。

不过，在颁奖礼的会场上，内心涌动的感慨在平复后反而显得异常平静。当他受邀上台发表得奖感言时，依然一贯从容，在不卑不亢中把华文报半个世纪以来，在马来西亚所面对的境遇、所扮演的角色、所传承的使命，以及对国家、对社群的功能娓娓道来。



但在他理性平和的语调中，却彰显着难以抗拒的张力：“我个人认为，这个奖不是对我个人努力的褒扬，而是对我任职半生的《星洲日报》在新闻事业及国家建设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的一份肯定。”

他详述了《星洲日报》的现实情况和办报理念：“作为一份报纸，服务读者是我们的天职。倘若我们做得好，我们便能和读者发展出一段相互尊重、恒久互惠的关系；倘若我们做得不好，读者将转向其他报纸、其他媒体。读者有很多的选择。”“可是这么简单的事实，往往被一些政治人物及怀有不明议程的人士遗忘。他们期望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支持他们的政策和举措，然而，我们必须恪尽我们的专业职责。要是其目的纯良高尚、行动计划透明，我们一定支持，无论背后有哪些政治信念和倾向；反之，若其动机可疑，行事违反基本人权，我们绝不支持。”

刘鉴铨话锋一转：“于华文报纸而言，由于许多政治人物与公务员看不懂我们的报纸，遂使得问题更为复杂。他们是依赖翻译内容得出结论。翻译员虽无恶意，但有时可能免不了无心之失。”

刘鉴铨并不回避事实：“无可否认，《星洲日报》一直面对着各种投诉。首先是来自读者的投诉。《星洲日报》每天的服务对象是人数超过百万的读者群众，我们无法满足每个读者，当中如有人不满，完全是预料中的事情。但就连不看报纸的人也投诉。比方说，这些非读者总是指责《星洲日报》为种族沙文主义者。”

刘鉴铨更不回避敏感问题：“的确，我们一直在反映马来西亚华人的种种不满，并且在许多课题上维护华人权益，那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但我们也一贯在‘一个多元族群、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的马来西亚’范畴下提出问题，绝不会从一个族群对抗另一个族群的视角看待问题。”“随之而来的指责是，我们不提倡多元族群主义。何其讽刺啊！事实上，我们对其他族群的报道要比其他语文报纸对华社的报道来得多。其实，我们比其他平面媒体的同行更致力于推动族群之间的了解和多元种族主义。”

刘鉴铨提到了媒体在政治环境下所面对的打压：“我们的对手也指责《星洲日报》老是抓着‘敏感’课题不放。什么是‘敏感’？我们国家（指马来西亚）还是那么不成熟吗？竟然有如此多的课题，让我们无法理性、客观地加以讨论？”

他引述了一位睿智的法学家的话：“要测试一个国家的成熟度，就要看这个国家谈论关键性课题的公开程度。”

他也引用了首相纳吉布的讲话：“不同族群与宗教间之所以会有恐惧、冲突和误解，根本原因在于无知及缺乏知识。”

那么，大家该怎么做？刘鉴铨给出的建议是：“真心诚实地对谈。带有偏见



的言论和话语只是逞个人意气，却伤害感情。互相伤害绝非我等应为。”

刘鉴铨表示，他相信在马来西亚独立 53 年后，经历了数十年发展的马来西亚人民，能以理智、文明的方式探讨国家课题，而不是诉诸过分或情绪性的言语。他说：“我们不能将事情都扫入地毯下，让情况继续恶化下去，抑或袖手旁观，然后期盼我们的下一代比我们明智，并且有能力解决我们惹出来的事端。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人性本善。如果我们真心地对别人好，别人必定同样回报我们。是政治令人性的丑恶毕露，我们应当奋力抗拒社会各个领域和生活各个层面的政治化。”“在我的新闻工作生涯里，我一直尝试唤起读者这种善良的天性。我深信，只要立足诚信和善意，就不会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话虽如此，我可以向您保证，作为一家报社，我们充分认识到某些事情的敏感性，尤其是不受宪法保障的事项。对这些事项可以理性地谈论到什么程度，我们是有分寸的。”

他说，除了“敏感”课题，一些人还指责华文报反国阵（也就是反政府），以及亲反对党。对此，刘鉴铨的回应是：“作为一份为马来西亚人民服务的马来西亚报纸，我们朝建立一个拥有多元族群、宗教和文化，但团结如一的国家而努力。因此，假如有人政策或举措与这目标背道而驰，即使他是当权者，我们都会仗义执言，我们视之为己任。”

他指出，自从有了互联网，人们更易获取信息。但有时候网上的信息是错误及有害的，因为网络几乎没有限制，任何人都可以散播谎言，甚至恶意诽谤他人。肇事者通常匿名，如此一来，他们更可以肆无忌惮地重复那些无知或伤害他人的举动。

“在这充斥着意识形态与信息的竞争市场里，请让我们有做好新闻工作的空间。如果我们畏缩，我们得做好承担后果的心理准备。”

刘鉴铨认为，报社无时无刻不受到各方的监察。在评断新闻工作者（事实上是评断媒体内容）方面，平面媒体、互联网或其他大众传播媒体，都应该以下列几个问题为依据：“一、事实有误吗？若有，寻求法律途径加以纠正是最佳的选择，可以针对不符事实的报道或观点提出诉讼。二、有虚构成分吗？倘若媒体人，例如新闻工作者及拥有很多追随者的博客、脸书（Facebook）或推特（Twitter）作者虚构事实，那是恶意、不诚实及不可饶恕的行为，应给予严惩。三、有违法吗？纵使没有不实或虚构成分，那么，有否违法呢？若有，应当采取相应行动，寻求民事诉讼。追究过失和适当的惩戒，必须依照法律办事，不能武断或任意妄为，这才是法治的内涵。”“不过，要是没有犯错或违反道德，没有违法，却还是造成了公共秩序的混乱，作者或出版者应该受罚吗？如果作者或出版者忽视作品或出版物可能带来的影响，他们必须承担后果。我崇尚新闻自由，但相信新闻自由应附带责任。我坚决认为，这种惩戒必须依照法律，而不是行政指令。”



而且引用的法律必须是公平、公正，而非压制性的。”

他补充说：“在通过上述的考验之后，我们期望可以在法律范围内行使宪法赋予我们言论自由的权利。我也坚决认为，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无论是政治人物、政府官员、其他媒体或公众人士——皆有同等的言论自由权利，而且应通过同样的考验。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不愿言论自由的权利被剥夺。同样地，我们也不愿看到，那些反对我们的人的言论自由权利被剥夺。我们极力捍卫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即使他们的言论是针对我们的。”

这是罕见且独特的获奖感言，在一个皆大欢喜、洋溢着喜庆气氛的会场上，借着“国家报人奖”颁奖典礼这个最恰当的舞台，刘鉴铨用他一贯“要说真话”的作风，表达了一个报人发自内心的新闻理想和内心诉求，甚至不担心会否触犯当权者的敏感神经，不在乎会否让一些人觉得不舒服。

对着台下的高官和同行，刘鉴铨摒弃浮泛的虚言与华而不实的空话，句句情真意切，让一个国家反省，并在反省中向前。

台下，掌声雷动。

颁奖仪式结束后，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祝贺，刘鉴铨说了很多“感谢”。他说，这“感谢”不是一种应对，是内心感恩之情的表达。他还说，人需要怀有一颗感恩的心，无论是对赞誉你的人还是质疑你的人，甚至反对你、诽谤你的人，你都要去感恩。因为，朋友会让你感受支撑的温暖，敌人则会让你更强大。

追求真理，自力图强，所以愈挫愈勇，百折不挠，这就是刘鉴铨，这也是《星洲日报》的成长秘诀和获奖真经。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联合总会（简称“华总”）会长丹斯里方天兴向刘鉴铨道贺，他说：“这个至高无上的国家报人奖，我想，对刘鉴铨是个肯定；更重要的是，他在媒体和新闻界不断努力追求、秉承和实践的专业、公平与正义的崇高精神。”

“刘鉴铨以将近半世纪的宝贵人生经验，为新闻工作和事业开拓对社会负责的新闻自由的新境界，并在他的团队和集团的努力下，让这种绝对符合马来西亚多元国情的新价值观，逐步成为主流，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国家报人奖”评审团主席丹斯里再努丁称赞刘鉴铨：“为新闻界树立了一套放诸四海皆准的新闻从业员专业主义，坚持新闻从业员的专业和标准原则，以身作则栽培了一批富有奉献精神和专业的新闻从业员，最后登上了事业的巅峰。”

“刘鉴铨经常自我警惕，要为整个报业负起全责，而不是为了任何一方的利益或个人利益服务；因此，《星洲日报》向来秉持正义、公平和人道精神的原则。”

再努丁透露，评审团一致认为，刘鉴铨是华文报界的无名英雄，因此，颁予“国家报人奖”是给予他最实至名归的荣誉。

再努丁说：“在报界服务 48 载的刘鉴铨是‘纯粹的报人’（Wartawan Tulen），不曾半途从政，半世纪都在报界耕耘。如果刘鉴铨也是一名从政者，则比较容易获得‘国家报人奖’，就如我和其他四名得主一样；但是，刘鉴铨一辈子坚持在报界服务，实在难能可贵。”

再努丁回忆《星洲日报》陷入财困时，时任《马来西亚前锋报》总编辑的他曾适时伸出援手；他也记得，当《马来西亚前锋报》的印刷机器坏了，《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也曾经协助印刷该报；新闻同业之间交情不浅，报业公司之间也不时互助。

“1987 年‘茅草行动’，《星洲日报》被吊销出版执照，当时担任总编辑的刘鉴铨为复办报纸而四处奔走，包括见了当时的首相敦马哈蒂尔。后来报社终于可以重新营运，却面对财务和新闻纸短缺的问题。”

“为了解决财务问题，刘鉴铨等星洲高层也找到现任世华媒体集团执行主席丹斯里张晓卿的支持，让《星洲日报》能够继续发展，成为除了中国之外，目前世上最大的华文报业集团。”

再努丁很欣赏刘鉴铨在担任《星洲日报》总编辑时，能够毅然改变当年华文报的传统，放弃采用国外新闻作为封面头条，改为专注于本国政经文教各领域的新闻，“当时这是创举，其他竞争者纷纷跟随”。

在英国社会，刘鉴铨的知名度和受尊重程度，其实并不亚于华社。因此，刘鉴铨不时会受邀到新闻研讨会或座谈会去演讲。另外，如果马来西亚发生大事件，外国通讯员在写分析文章前也会咨询刘鉴铨的意见。但刘鉴铨在给他们提供资料或意见时，总是提出一个条件：不能提他的名字。

同是资深媒体人的首要媒体集团执行主席佐汉·嘉化（Johan Jaaffar）表示高兴看到刘鉴铨获奖。他指出：“刘鉴铨和首要媒体集团的拿督阿默达立（Ahmad A. Talib）皆是我国‘最后的莫希干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喻濒临绝种的人）。当今世上，尤其是在这片土地上，还有多少像他们这样的报人？直到今天，他们依然从事新闻工作。和他们同一辈的人可能早已另谋高就去了，抑或永远离开了新闻行业。又或是在某些情况下，就像那些杰出的记者们一样——他们不是逐渐淡出，而是离开了人世。”

“在刘鉴铨身上，反映出杰出新闻工作者的献身、坚持和奋斗精神。他心中那团熊熊的火焰持续燃烧到今天，实在令人敬佩。可以借此提醒年青一辈的新闻从业员，新闻事业并不只是报道新闻，还包括了幕后的人物——纸媒的无名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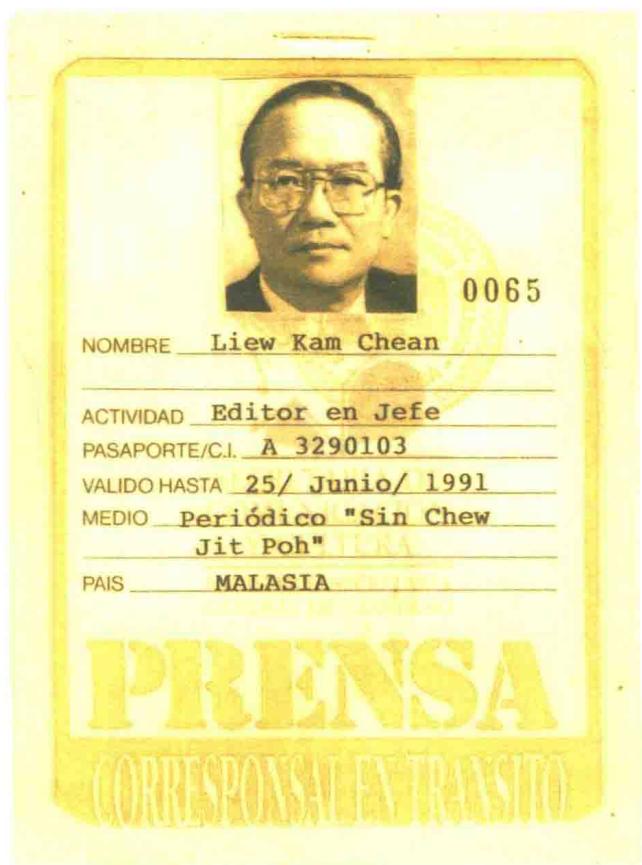
在华人人口仅占国家总人口约四分之一、华文并非官方媒介语的马来西亚，华文报人能够获得“国家报人奖”，有着华文报受到国家肯定的深层意义。

其实，对个人来说，今时今日的刘鉴铨并不需要一个奖项来肯定他在新闻界的贡献，但他代表的是华文报，他的得奖也意味着华文报的努力与地位终获马来西亚政府的认可。这样的荣誉对华文报人来说既属前无古人，随着媒体生态的急剧变化，也可能会后无来者。

但刘鉴铨认为：“历史自然无法更改，但是，未来有各种可能性。今天的我，是报业形势造就的。”

身为一个马来西亚人，刘鉴铨以忠于自己的民族及国家、致力于促进族群和谐为己任。他一直通过媒体传递这个理念：“在我们这种多元文化、多元语文、多元宗教背景下，要建立一个团结融洽的国家，必须让各民族循序渐进地自动融合，而不是通过强制或者同化来达到预定的目标。”

这是刘鉴铨的理念，也是《星洲日报》一贯的办报理念。



刘鉴铨证件